

现代产业学院的本质意蕴、 生成动力与共建机制

丁建洋

(盐城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现代产业学院是把产业发展需求作为学院组织建制的内在逻辑,通过知识运作与组织运作等学院组织核心要素的创新而形成的一种新形态学院组织。现代产业学院的生成动力源于追求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的融合,弥合传统学院组织与企业之间知识运作的分立,形成知识运作一体化。现代产业学院这些内在机理的实现,需要统合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整合大学、企业、政府的组织角色与管理功能,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型构多元主体的共建机制。

关键词:现代产业学院;学院组织形态创新;本质意蕴;生成动力;共建机制

DOI:10.13397/j.cnki.fef.2025.02.012

The Essence, Driving Force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DING Jian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reflects the intrinsic logic of organizing instit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emerges from the innovation of core elements such as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within college structure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is innovation stems from the pursuit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logics, bridging the gap in knowledge opera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ollege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nd thus forming an integrated knowledge operation system.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inherent mechanisms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mpacts from both market and policy mechanisms. It also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roles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at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reby form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Keywords: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innovation in college organizational forms; essence; driving force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现代产业学院是中国大学自发探索形成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新形态学院组织,已经成为贯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织形式。2007年前后我国高职院校率先开始探索产业学院建设。近年来,普通院校、职业院校都普遍性地创设了数量不等的产业学院,教育部以及一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还从中遴选了一批重点建设对象,可见产业学院已经成

为大学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职能与产业进行整体性融合的重要组织形式。从大学与行业、企业自发探索到政策引导推进产业学院建设,从使用行业、企业的具体名称命名产业学院,到国家政策明确提出“现代产业学院”的一般性概念,表明深化现代产业学院(以下简称产业学院)建设已经成为大学与企业的集体行动。与此同时,在大学与企业的自发

性、个性化探索走向大学系统与产业的整体性、理性化建设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特别是对“产业+学院”走向“产业学院”而导致传统学院组织形态的质性改变以及对新形态学院组织本质特征、形成机理等方面的解释,还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学理建构。本文首先阐释这种新形态学院组织的本质意蕴与生成动力,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建构产业学院的共建机制,从而为产业学院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与设计奠定基础。

一、现代产业学院的本质意蕴

现代产业学院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主要以院校为依托主体,充分发挥企业重要教育主体作用,突破传统的按照学科门类进行组织建制的学院组织形态,聚焦现代产业发展需求,按照现代产业门类进行组织建制,大学、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建的一种新形态学院组织。产业学院的基本内涵及其内蕴的本质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产业学院是一种新形态学院组织。组织形态之新的核心是学院组织建制的内在逻辑发生了转型,即从传统的按照学科门类进行组织建制转向按照现代产业门类进行组织建制,由此导致学院组织的创设方式、战略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组织形态发生了质变。同时,多主体共建的产业学院在组织形态乃至产权或所有制结构上,虽然与传统学院组织相比有所创新,但本质上仍然是以大学为依托主体的学院组织,是学术性组织,大学是共建主体中的核心主体。因此,把握产业学院组织形态之新需要弄清楚,传统学院组织的本质特征与要素结构是什么,产业学院与传统学院组织的异同又分别是什么。只有通过比较提炼出产业学院的本质特征与要素结构,才能为产业学院的科学运行奠定理论基础。其二,产业学院有其特有的生成动力。产业学院的创设源于大学与企业等主体对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如果这种需求仅存在于大学或企业或其他任何主体中的某一方,特别是企业如果缺乏共建的内驱力,则难以创设产业学院。所以,如何促进产业学院的创设需要弄清楚,这种新形态学院组织形成的逻辑机理与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激发企业等主体参与共建产业学院的内生动力。其三,产业学院有其特殊的运行机制。产业学院的创设源于追求教育与产业的融合以及由此引发大学、企业、政府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其关键特征在于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

产业学院的运行。所以,对于产业学院的运行需要弄清楚,如何建构多元主体的共建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运行机制的构造,从而实现产业学院的可持续发展。

对产业学院内在本质的解构与建构,首先需要追溯大学—学院组织建制的历史演化过程。大学—学院的组织建制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大学的原型之一——巴黎大学。巴黎大学“起初存在的是一个庞杂的社团,包括整个教学团体,而不考虑具体的专业。然后,在这种联合体的怀抱之中,逐渐形成了限制性更强的群体,它们的划分基础是围绕特定研究的兴趣共同体而导致的亲合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些有所限制的群体渐渐趋于稳定,并且在整个群体当中越来越获得自主性。院系就这么形成了。”^{[1][36]}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大学的大学—学院组织体系成为大学内部组织建制的基因。及至近代,柏林大学扩展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并在组织形式上进行了创新,设置了“研究所”,并与“讲座”逐步“合二为一”^[2]作为学院组织中的基层组织,但学院组织仍然是大学内部权力集中的组织,大学—学院组织体系仍然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建制。美国在传承“英国式”大学、借鉴“德国式”大学的基础上开启了大学的现代化,大学内部的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形成了“研究生院”“学系”等新的组织形式,构建了“三级管理、院为基础”的组织体系^[3],但大学—学院组织建制仍然是大学内部组织体系的内核。我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先后借鉴日、美等国的大学组织形式,形成了大学—学院组织体系。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及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大学主要模仿苏联的大学—系组织体系,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回到了大学—学院的组织体系。历史地看,大学—学院组织建制在不同大学模式中虽有“变异”,但其作为大学组织体系“遗传”的内核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大学—学院组织建制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大学”与“学院”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生成逻辑。大学首先是学科专业组织化的产物,为学科专业“高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生存与发展空间,是“专业学院的松散联合体”^{[4][34]};其次,大学还是追求“普遍知识”或特定学科专业门类“普遍知识”的产物^[5],不同历史阶段与国家大学中的“艺学院”“哲学院”“文理学院”“教养学院”等往往是大学的“一间公用的前厅”,任何人要想进入其他的“学科专业性”学院学习都必须先经过它^{[1][42]}。而“学院”则是以特定知识门类为单元的学科

专业的产物,特定知识门类不仅决定学院的学科专业边界,还决定学院运行的内在逻辑^{[4][43]}。“学院”实际上是大学这一“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总体矩阵”中的“基座”^[6]。概言之,“大学”与“学院”两者的逻辑关系是:“大学与学院的同时存在,正是在两种极端(过于分散与过于集中)之间求得一个积极平衡所需要的,正是学科积极发展所需的。”^[7]学院是追求知识学科化与专业化的产物,是大学实现知识功能的核心组织载体,具有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同时还是大学整体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大学为学院的知识活动提供组织化支持。大学与学院在相互建构中生成,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种生成与统一的根基是学科专业发展需求。

通过对大学—学院组织建制历史演化与逻辑机理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学院组织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学的“学院”是学科专业知识化与组织化相互建构的产物。从学科专业的组织化视角来说,学院位于大学与学系、教研组等基层学术组织之间,是大学的学科专业进行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职能的核心组织载体。从学科专业的知识化视角来说,学院组织围绕两种不同性质学科专业知识进行运作:一种进行通识性高深学科知识运作,以自由教育为目标,形成“文理学院”;另一种进行专业性高深学科知识运作,以专业教育为目标,形成“学科学院”。两种不同性质学科专业知识的共同特征是学科逻辑导向下的纯粹学术取向。第二,大学的“学院”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围绕学科专业知识运作,学院组织进行向上与向下组织拓展,向上拓展形成学院组织集合体的大学,向下拓展形成学系、教研组、课程组、研究所、学生成长辅导机构等基层教学、科研组织以及管理机构,为学科专业知识运作提供组织化支持。学院组织的运行往往基于特定门类学科专业知识的运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这是大学为什么把学院组织作为实现大学职能、开展对外合作的重要组织载体,而不是大学,也不是学系、教研组等基层教学科研组织以及管理机构的重要原因。概括来说,大学内部传统学院组织的本质特征就是把学科专业发展需求作为组织建制的内在逻辑,通过知识运作与组织运作两个核心要素的相互建构,形成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学术组织。

产业学院则是传统学院组织的现代转型,旨在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按照现代产业门类进行组织建制,

寻求学科专业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共通点,通过学院组织的知识运作与组织运作两个核心要素的创新及其相互建构而形成的一种新形态学院组织。产业学院的本质特征有二:其一,知识运作方式突破传统的纯粹学术取向,把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相融合,突出学术的应用取向。既追求人才(学生与员工)培养、知识传播的纯粹学术价值或间接经济价值,又追求研发成果的转化应用,创造直接经济价值,追求知识价值的多元性,从而超越传统学院组织主要处于知识生产与传播阶段、企业主要处于知识应用阶段的分立、单向、线性知识运作方式,追求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过程的完整性,注重大学与企业之间知识运作的循环,终而形成知识运作过程与方向的多元性。其二,组织运作方式创新。上述这些有别于传统学院组织的知识运作方式,必然突破大学单一主体主导的组织运行机制。大学通过向产业学院放权,提高产业学院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与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学科专业与产业发展形成有效对接,与企业等组织合作形成多元主体共建的相对独立完整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从而围绕现代产业发展形成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相互贯通的完整知识运作职能。

通过对产业学院与传统学院组织的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大学内部的学院组织,具有学院组织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学科专业是知识运作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运作的学术性与组织运作的复杂性等特征。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产业学院把产业发展需求作为组织建制的内在逻辑,追求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的统一、学科专业与产业发展需求的融合,从而导致知识运作与组织运作方式的质性改变,知识运作具有多元性,组织运作具有多主体性。

二、现代产业学院的生成动力

产业学院在知识运作与组织运作等方面呈现的学院组织形态创新蕴含了对高等教育逻辑(以下简称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融合的追求,通过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的交叉、互补、融合,实现大学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职能与企业的员工培训、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职能之间的互动、贯通、融合。“教育”与“产业”都是抽象的集合性概念,是大学等教育组织与企业等产业组织及其职能活动的总和,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性活动,各有自己的目标、任务,应当遵循各自的运行规律和活动过程”^[8],教育逻辑与产业

逻辑体现在作为“教育”与“产业”组织的大学与企业的本质属性与职能活动当中。教育逻辑是大学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职能活动的基本规律。教育逻辑以“高深知识”为逻辑起点^[9],追求高深知识在学习者与学科发展以及社会服务中的应用,以公益性与公平性为主要价值标准,注重未来价值的创造,追求学习者与学科发展以及社会服务价值的实现,教师、学生、课程、科学、高深知识、学术权力、办学资源等构成教育逻辑的关键要素。产业逻辑是企业的员工培训、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市场交易等职能活动的基本规律。产业逻辑以产品为逻辑起点,通过以知识为载体的产品、技术、信息、服务等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以营利性与效率性为主要价值标准,注重即时价值的创造,追求市场价值的实现,管理者、员工、产品、技术、市场需求、产业资源等构成产业逻辑的关键要素。

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的共性主要是,把知识作为主要运作材料,追求知识价值的创造。教育逻辑直接把高深知识作为逻辑起点,通过以知识为载体的课程、论文、专利、科学、技术等为学习者、教师、服务对象创造价值。产业逻辑把产品作为逻辑起点,通过以知识为载体的产品、技术、信息、服务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来创造价值。虽然两者的共性主要是通过知识的运作来创造价值,但由于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属于不同部门的运行逻辑,体现不同部门的运行规律,在知识运作的主体结构、运作过程、表现形态、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异质性。教育逻辑中的知识运作,主要以大学的教师与学习者为主体,追求知识的科学化超越,崇尚知识的价值理性,主要处于生产与传播阶段;而产业逻辑中的知识运作,主要以企业的员工为主体,追求知识的技术化与产业化应用,推崇知识的工具理性,主要处于应用阶段。在这些差异化的知识运作中,根本性差异是对知识的价值及其产权利益追求的不同而导致两种逻辑之间的分歧。

正是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禀性的异同以及对两种逻辑融合的追求促进了产业学院的生成。这种生成的动力可以分为一般动力和特殊动力。追求两种逻辑融合的一般动力主要表现为:大学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资源供给等受到产业发展水平与需求的影响,需要和产业链中不同节点与发展水平的企业进行合作;同时,产业的员工培训、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市场拓展等也受到教育发展水平与供给的制约,需要和大学系统中不同类型与层级的院校进行

合作。正是由于存在追求两种逻辑融合的一般动力,产业集群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院校在本世纪初率先探索产业学院建设,聚焦职业与岗位需要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面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技术与产品开发。随着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的转型升级,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互动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引发大学系统中不同类型与层级的院校和产业链中不同节点与发展水平的企业进行互动来共建产业学院。

在上述一般动力的基础上,知识经济社会中还有着追求两种逻辑融合的特殊动力。产业学院的创设与运行主要由特殊动力所决定。随着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化与市场化的深度交融发展,教育与产业活动的基本材料——知识的运作过程与运作内容趋向复杂化。知识从生产、传播到应用的运作过程中,知识运作方向从传统的单向、线性、分立行动走向双向互动运作;同时,知识在双向互动运作过程中,知识运作内容即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两种形态知识,从边界清晰走向边界模糊并加速相互转化,因而在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过程的每个环节,又存在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之间的互动运作。这种复杂化的知识运作方式可以概括为知识运作一体化,即知识的运作过程(生产—传播—应用)与运作内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交织互动^[10]。知识经济社会中的这种知识运作方式必然要求大学与企业、研发机构、政府等开展跨部门、跨组织的紧密合作,构建知识运作一体化的平台,超越传统的通过部门专业化、组织科层化以及知识行动分化等路径提高知识运作效率与价值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形式。创设产业学院的目的就是整合政产学研等不同部门与组织的资源,统合人才(学生与员工)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知识运作的不同过程与不同内容,构建知识运作一体化的平台。这就是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化与市场化的深度交融演进而引发产业学院生成的特殊动力,也是关键动力。

追求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的融合,在促进产业学院生成的同时,也为产业学院运行带来了“先天性”的内在矛盾。

矛盾之一是大学与企业等主体之间利益的协同与冲突。利益的协同体现在:大学通过产业学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研发成果转化,降低办学成本;企业通过产业学院降低员工培养与产品研制成本,促进新技术应用,提高产品质量。但是在这些协同性利益

当中,既有产权边界清晰的设施设备与专利技术等,也有产权无法清晰界定的课程与科学发现等,还有成果产出导向多元的人力资源等。这些协同性利益大多具有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双重特性,而且更多的是产权无法清晰界定即“产权不完全性”的公共物品,以及成果产出难以清晰界定归属的人力资源^[11];不仅如此,这些协同性利益还存在着长期性与短期性、风险性与确定性、潜在性与现实性等方面的差异,这就导致多元主体在追求利益协同的同时还存在着利益冲突。所以,产业学院运行过程中如果利益冲突过多,对企业来说,就不如建立自己的“企业大学”^[12]来实现产业学院的功能;而对大学来说,就不如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市场化”^[13]道路来实现产业学院的功能。因此,打破这种两难困境的关键就是实现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利共赢,既防止两者在共建过程中完全是“组织间市场关系”,又防止“从组织间市场关系到组织内部科层制关系的转化”^{[14][28]}。利益协同与利益冲突之间矛盾的纾解,首先指向大学与企业等多元主体对产业学院共建机制的型构,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构造。

矛盾之二是大学与企业之间知识运作方式的协同与冲突。大学具有追求纯粹学术与运作学术知识的习性,知识运作主要处于生产与传播阶段,追求知识的科学化超越,强调知识在学术系统内部的循证;而企业具有追求应用学术与运作应用知识的习性,知识运作主要处于应用阶段,追求知识的技术化与产业化应用,强调知识在技术与市场体系中的应用。知识运作习性的差异必然导致大学与企业之间知识运作方式的冲突。大学与企业之间知识运作方式的协同之处在于:从知识运作主体来说,提高人才(学生与员工)的知识运作能力是两者的共同追求;从知识运作过程来说,两者都具有知识运作过程断裂的习性,都试图构造完整的知识运作过程,进行“有组织的”知识运作与知识创新^[15],从而创造知识的完整价值;从知识运作内容来说,两者都试图超越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分立,形成知识科学化与技术化之间的互动,推进知识的产业化应用,创造知识的完整价值。这些知识运作的协同之处就是大学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的基点,然而部门习性差异、组织边界区隔的客观存在无法避免知识运作方式的冲突。产业学院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融合不同部门、不同组织之间的知识运作方式,形成知识运作一体化。这种融合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也指向大学与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建机制的型

构,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构造。

三、现代产业学院的共建机制

产业学院对教育逻辑与产业逻辑融合的追求以及对所衍生的“先天性”内在矛盾的化解,首先指向大学、企业、政府等跨部门、跨组织的多元主体对产业学院共建机制的型构。这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宏观层面主要包括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之一。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16]因此,宏观层面共建机制型构的目标就是充分发挥并统合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社会资源向产业学院集聚。宏观层面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效应的发挥与统合,需要大学、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通过组织角色的科学定位与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形成微观层面的组织主体共建机制,继而通过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共建机制的相互建构,实现产业学院共建机制的型构。

市场机制是把价格作为资源供求信息的传递者,市场主体在资源供求中进行竞争,通过供求形成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社会资源调节机制^[17]。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市场主体以利益的获得为价值旨趣,追求利益的私有性、效率性、短期性。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状态等原因,常常出现因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或失当而造成市场失灵现象。社会是一个多部门构成的系统,市场机制虽然主要运用于经济部门,但对教育等公共部门也会产生调节作用。政策机制是政府作出并实施政策形式决策的逻辑目的与策略方式^[18]。因为社会运行中存在公共利益,所以无法完全用“无形之手”的市场机制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调节,从而导致“集体选择制度”的产生,通过其对市场机制的互补或替代实现政府的“有为”与“有形之手”功能^[19-20]。政策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关键是匹配政策对象属性,科学地设计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执行策略,从而避免出现政府失灵现象。政策机制具有人为设计性,以公共利益的获得为价值指向,追求利益的公共性、稳定性、长期性。为了维持社会系统的平衡和规范市场机制的运行,政策机制作用于行政、市场以及社会领域,尤其是教育等公共部门。政策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宏观层面对社会资源的供求关系进行

调节的机制;不同点在于,市场机制主要通过价格对供求关系进行竞争性调节,政策机制主要基于社会公共需求对供求关系进行公平性或补偿性调节,从而作为市场机制的互补或替代。

产业学院建设面临的课题主要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资源互动与集聚。

市场机制对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资源配置发挥着不同效应。“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究其本质来说,不属于经济领域的活动。”同时,学校虽然“不是营利组织,但它具有经济功能,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21]。因此,市场机制在教育部门的应用存在一定范围与界限,如:无法“把教育、知识、人才都看作商品”,无法“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师生关系和院校关系”^[22]。在教育部门的关键要素当中,在研发成果转化中可以产业化、市场化的技术、信息、服务等要素,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课程、高深知识等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要素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市场机制在教育部门的应用存在一定范围与界限的原因主要是,“在高等教育中,教学、研究和服务的基本产出受到高度补贴,价格是不完善的信号工具”^{[23]11}。“对整个社会而言,教育产出是至关重要的关注点,教育因而具有很高程度的集权协调”^{[23]序言}。产业部门则不同,产业部门的关键要素诸如产品、技术、市场需求、产业资源等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这就是大学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产教之间实现深度融合的瓶颈所在,两个部门主要受不同资源配置机制的调节,特别是同时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共性资源较少。市场机制对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资源配置的不同效应之于产业学院建设的重要启示是:要有市场意识,注重设施与设备的共建、院校师资与企业工程师的共享,能够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共建共享的资源,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要注重成果转化,把以知识为载体的技术、信息、服务等成果及时转化为可以产业化、市场化的产业要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要注重市场机制运用的边界,教育部门本质上属于社会领域,而不是市场领域,虽然高教部门具有内部市场,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外部市场相互作用较少。

在市场机制作用与范围有限的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政策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政策机制在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中的作用方式同样具有不同特点。教育部门的关键要素,如课程、高深知识等具有公共物

品属性的要素主要受政策机制调节。产业部门的关键要素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集中于市场领域,受政策机制调节的要素较少,主要是产业方向、产业布局的调整等。企业在有限理性的作用下,主要追求确定性的利益,难以顾及潜在性、风险性的利益以及不完全性产权要素的利益。所以,产业学院建设宏观层面政策机制构建的重点是:首先要科学界定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中关键要素的属性,具有完全产权又可以产业化的要素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具有不完全性产权又难以产业化的要素主要通过政策机制进行调节。因为不完全性产权要素特别是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要素在产权的界定、归属、收益等方面难以做出清晰估价,能否产业化难以做出清晰判断,所以这些要素是政策机制设计的难点。其次需要在科学界定政策对象属性的基础上,设计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执行策略,构建融合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不同领域属性的政策机制。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统合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产业资源与大学资源在产业学院的互动、集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何组织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资源的获取^[24],产业学院的发生、发展实际上就是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对大学资源与产业资源进行融合而形成有别于传统学院组织的特有资源,从而实现对传统学院组织职能与绩效的超越。多元主体以产业学院为平台进行资源的互动与集聚,从过程来说主要包括资源的识别、配置及治理等过程,其中识别与配置既是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又是治理的内在构成。

第一,产业学院资源的识别。产业学院的资源主要分为物性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等三类。物性资源是指具有物质属性或者能够转化为物质属性的资本、权力、声誉等方面的资源。知识资源是指课程、科学论文等基础性研究成果、专利技术等应用性研发成果等方面的资源^[25-26]。人力资源是指管理者、大学教师、企业工程师以及行业未来从业者(学生)等人才资源。对物性资源或知识资源可以从不同视角进一步细分,如产权视角可以分为完全产权与不完全产权两类,产业化视角可以分为易于产业化与难以产业化两类。对人力资源可以从成果产出视角进一步细分为产业化成果、公共物品属性成果等不同产出导向的人力资源。产业学院资源的复杂性为资源的识别带来了难题,多元主体只有对产业学院资源的需求内容、类型属性、调节机制、绩效产出、收益归属等方面

进行全面准确识别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将资源配置到产业学院。

第二,产业学院资源的配置。在对产业学院资源进行全面准确识别基础上,多元主体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政策机制的有为性,在协商与博弈中达成资源的配置方式。具有完全产权又能产业化的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具有不完全性产权又难以产业化的资源主要通过政策机制进行配置。人力资源的共建共享主要以成果产出为标尺,以产业化成果为主要产出的人力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共建,以公共物品属性成果为主要产出的人力资源主要通过政策机制进行共建。

第三,产业学院资源的治理。在对产业学院资源进行识别、配置的基础上需要对产业学院资源从单一组织内部、组织间的分立化治理走向以产业学院为组织基础的整合性治理,即:多元主体既把产业学院作为自身“治理机制”的一个层级^[27],把产业学院资源的识别、配置、治理融入自身治理机制;又把产业学院作为组织基础,形成组织间治理机制的“内在化”^{[14]29}。进而通过组织自身治理机制与以产业学院为组织基础的整合性治理机制的相互建构,多元主体形成产业学院微观层面的共建机制。相对于组织自身治理机制的完善而言,整合性治理机制的形成是关键,其核心是不同主体科学定位自身的组织角色,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功能。

大学需要充分发挥核心主体作用。多元主体共建产业学院本质上是“多中心协同”^[28],而核心主体作用就是在多中心协同的复杂网络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由于产业学院依托于大学,大学对产业学院资源的识别、配置、治理能力处于优势地位,对大学职能发挥的溢出效应也最大,大学在多中心协同的复杂网络建构中理应发挥主导作用。第一,大学要主导产业学院资源的识别、配置、治理。大学要将产业学院需要哪些资源、产出哪些资源、预期收益如何、如何配置资源等信息在共建主体中进行全面共享,对不同属性资源的投入方式、绩效产出、收益分配等关键问题进行系统评估,从而使大学在产业学院资源的识别、配置、治理过程中形成最早的发生功能与发挥最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企业、政府等主体生成共建产业学院的内驱力。第二,大学要充分发挥产业学院绩效产出的效率优势。从组织发生学角度看,产业学院之所以形成与发展就在于通过对多元主体投入资源的融合而形成的绩效产出,超越大学单一主体基于传统学院组

织或其他主体基于组织自身对资源投入的绩效产出,通过产业学院这一“中间环节”提高了绩效产出的“规模效率”与“范围效率”^{[14]32-33}。其主要标志是,产业学院通过大学职能与企业职能的融合,人才(员工)培养、科技研发、产品研制、工艺创新等职能效率在规模上的提高与范围上的拓展。对大学而言,这些效率优势除了追求对大学职能的贡献度之外,更加强调对企业和政府职能的贡献度。例如,产出要素具有市场的自生自发性,具有降低企业开发相关产业要素成本与风险的优势,能够激发企业参与共建产业学院的内驱力;产出要素对区域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具有创新驱动功能,能够激发政府推动政策机制创新,乃至直接参与共建产业学院。

企业需要充分发挥“重要教育主体作用”^[29],即充分认识大学在人才培养与科技研发中具有开发产业要素的长期性、引领性、超越性功能^[30-31],形成共建产业学院的内驱力并在共建中发挥主体性功能。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看,企业就是“当一个企业家控制某种资源时出现的关系体系”,进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合作”。在所有这些“关系体系”中,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发生与发展,是因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32]。企业整合与利用大学供给的人才、技术等要素,不能仅从短期的、现实的角度,而要从长期的、引领的角度,追求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是企业把大学作为重要“关系体系”,充分发挥重要教育主体作用的逻辑依据所在。企业重要教育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要履约重要教育主体作用的社会责任。企业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社会主体,履约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其本质属性和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是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企业超越社会分工、组织边界的隔阂,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稳定收益与风险收益等不同性质利益统合起来,充分认识产业学院在产业要素从长期性、引领性、潜在性向短期性、创新性、现实性转化与供给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特别是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要充分认识产业学院在开发未来技术、新兴市场等方面的引领功能,从产业链的整体发展出发,带动产业链中的企业共建产业学院。第二,企业要充分利用产业学院绩效产出的效率优势。企业着力聚焦产品研制、工艺创新等产业发展的生产性、市场性职能,将企业的员工培训、技术开发等产业发展的教育性、研发性职能转移至产业学院,充分利用产业学院绩效产出的效率优势,降低企业的

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这些效率优势的利用内在要求企业对产业学院资源进行系统分析,从产权、产业化、成果产出等不同视角对资源进行科学界定与分类,对资源进行早期识别、敏锐配置、嵌入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产业学院在教育、研发等职能在规模与范围上的效率优势。

政府需要充分发挥政策主体作用,即通过政策机制对市场机制的互补或替代功能,推动大学核心主体作用与企业重要教育主体作用的发挥。大学部门属于社会领域,产业部门属于市场领域,由于部门属性的差异,政策机制的匹配与统合问题成为政策机制设计的难点。政府政策主体作用发挥的关键是,针对大学部门与产业部门的不同属性,构建多元权变政策机制基础上的统合性政策机制。多元权变政策机制就是打破传统单一化的主要用于行政领域的行政主导机制,针对产教领域不同属性构建政策机制并合理与灵巧地匹配相应领域^①。而统合性政策机制就是在政策机制匹配相应领域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政策机制逻辑目的与策略方式的最大公约数。政府的可操作性策略是,针对产业部门,在与企业的互动中设计政策目标,构建导向型政策工具,运用扁平化、去行政化的政策执行策略,构建多元博弈的政策机制,即“市场主体参与和由政府引导的多元博弈机制”^[18],促进企业生成共建产业学院的内驱力。针对大学部门,在与大学的互动中设计政策目标,构建影响型政策工具,运用扁平化、去行政化的政策执行策略,构建影响网络的政策机制,即“有策略的通过影响网络的方式提升价值诉求的一致性”^[18],促进大学生生成共建产业学院的内驱力。在多元权变政策机制的基础上,寻求政策机制因变量统合的最大公约数,构建统合性政策机制。政策目标方面,充分认识大学与企业的异质性,对产业学院资源进行科学界定和分类,促进大学与企业对产业学院资源的识别、配置、治理形成理性共识。政策工具方面,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创新财政投入、税费减免、项目供给、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形成具有导向型与影响型共性的组合性政策工具,激励大学与企业将优势资源配置到产业学院。政策执行方面,重点观测大学与企业围绕产业学院资源识别、配置、治理的关系发展,将扁平化、去行政化的政策执行策略与有为政府的强大组织协调能力有机融合起来,激发大学与企业形成共建产业学院的持续动力。

注释

①本文关于政策机制、多元权变政策机制的分析框架、具体策略主要运用赵静、薛澜的观点。参见文献[18]。

参考文献

- [1]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汤智,李幼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机制:国外模式及其借鉴[J].教育研究,2015,36(6):136-144.
- [3]赵炬明.从跟跑到领跑:美国的经验与中国的未来——中美科技竞争下美国科学体系与研究型大学制度研究系列之一[J].高等教育研究,2023,44(1):25-45.
- [4]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M].张弛,郗海霞,耿益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 [5]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 [6]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13-114.
- [7]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366.
- [8]潘懋元.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大学教学,2008(3):15-17.
- [9]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
- [10]丁建洋.应用型大学微观课程实施的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行动方略[J].复旦教育论坛,2020,18(4):51-56,71.
- [11]周慧文.高校产教融合困境及其突破——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1(1):59-72.
- [12]梅斯特.企业大学:为企业培养世界一流员工[M].徐健,朱敬,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212.
- [13]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晓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封面.
- [1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5]柯拉尔,弗朗汉姆,佩里,亨特.有组织的创新:美国繁荣复兴之蓝图[M].陈劲,尹西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57-59.
- [16]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M].萧琛,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
- [17]谈敏,丛树海.大辞海(经济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52.
- [18]赵静,薛澜.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运用[J].中国社会科学,2021(10):39-60.
- [19]刘儒,王媛.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关系[J].甘肃社会科学,2018(5):200-205.
- [20]韩梦洁.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市场机制、公共选择与学术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16.
- [21]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47-348.
- [22]胡赤弟.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5.
- [23]盖格.大学与市场的悖论[M].郭建如,马林霞,等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3.

- [24]《管理学》编写组.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0-21.
- [25]丁建洋.应用型大学类型化的逻辑意蕴、建构机理与价值旨趣[J].高校教育管理,2019,13(4):99-107.
- [26]丁建洋,李志峰.塑造国家意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创新[J].大学教育科学,2024(5):19-27.
- [27]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石烁,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6-29.
- [28]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98-120.
- [29]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8/28/content_5538105.htm)

[zhengceku/2020-08/28/content_5538105.htm](https://www.gov.cn/zhengceku/2020-08/28/content_5538105.htm).

- [30]展立新,陈学飞.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1):95-125.
- [31]鲁洁.超越性的存在——兼析病态适应的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6-11.
- [32]刘志彪,等.产业经济学[M].第2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2.

收稿日期:2024-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现代产业学院组织运行机制研究”(BIA220058)

作者简介:丁建洋,盐城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